

唐宋八大家名篇注译之六

苏辙散文

湛 芬 编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目 录

苏辙和他的散文·····	(1)
上枢密韩太尉书·····	(7)
上皇帝书·····	(12)
自齐州回论时事书·····	(25)
为兄轼下狱上书·····	(32)
商论·····	(37)
六国论·····	(42)
三国论·····	(47)
隋论·····	(53)
唐论·····	(60)
臣事策一·····	(70)
臣事策四·····	(76)
臣事策二·····	(83)
乞责降韩缜第七状·····	(90)
乞诛窜吕惠卿状·····	(96)
乞牵复英州别驾郑侠状·····	(109)
孟德传·····	(111)
巢谷传·····	(115)
东轩记·····	(122)
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·····	(127)

吴氏浩然堂记..... (130)

武昌九曲亭记..... (133)

黄州快哉亭记..... (138)

遗老■记..... (143)

墨 ■ ■ (147)

子瞻■陶渊明诗集引..... (152)

苏辙和他的散文

湛 芬

在中国数千年文学长河中，一门三星高耀的情况并不鲜见，而苏辙父子三人则是其中的佼佼者。“三苏”当中，苏辙年最幼，可这并不影响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，与其父苏洵和兄苏轼一样，他的文章在生前就已为人们广为传诵，并流传到少数民族地区[1]。这些文章，都是其政治生涯和一生为人的集中写照，文如其人，文见其人，的确如此。

自从赵匡胤开国之初起，宋王朝便种下了积贫积弱的根苗。经过几十年的文恬武嬉，至仁宗末年真可谓危机四伏、百病丛生，而二十三岁的苏辙却正在此时步入政坛。他凭着满腔的政治热情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，大胆向统治者袒露心声，直言为政得失，虽因此遭受祸殃，但并无丝毫悔改之意。随着政治生活的深入，他对各种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了解更加透彻，认识也更深刻，因此，神宗即位之初，他便不顾自己官卑位微，毅然上书极论时政，认为“今世之患，莫急于无财”，“方今之计莫如丰财”[2]，敏锐地看到了宋王朝表面升平背后的积贫积弱本质，并终生为改变这种状况而努力。

王安石推行新法，引出了新旧党之间长达几十年的纷争，苏辙其间也痛遭谤毁，不仅政治上倍受排挤打击，而且著作也惨遭焚毁，并在后世还被划入了保守派。其实，王安石变法的

问题虽然很复杂，但根本目的还是想增加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，改变国家财力枯竭的状况，这实际上与苏辙“方今之计莫如丰财”的观点是一致的。新法的推行，固然对大地主阶级的得益■■■抑损，但受害更多的则是贫民下户。由于宋王朝官僚机■本身的腐朽，甚善的法令也在推行中变了质，各种税钱都强行抑配”（摊派）到老百姓身上，而豪强地主的负担，最终也转嫁给了贫苦农民，因此，到后来得王安石提拔并思报恩的郑侠等人，也不得不把民间疲惫不堪的情况如实相告[3]，王安石本人也在熙宁八年（公元1075年）再次拜相时有所悔悟，写下了“膏泽未施空谤怨，疮痍犹在岂讴吟？”这样的诗句[4]。由此可见，王安石变法本身就具有两面性，所以对苏辙的态度也不能一概而论。苏辙对新法的批评，不是为了一人一家之私，位卑而名高的苏辙兄弟，当时若要希图富贵，根本用不着挖空心思去巧合逢迎，只消随声附和，甚至默不作声，就可青云直上，苏辙奋起论争，确是出于对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维护。所以，苏辙前后对新法的批评，虽有偏激片面之处，但他所预言的新法弊端，也多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。

苏辙政治品格的可贵之处，就在于他对自己政治理想的执着追求和秉持公心、直言敢谏、实事求是的精神。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，苏辙历尽磨难，从神宗初期上书抵王安石新法开始，多次遭到贬谪，至哲宗即位，方得重用。短短几年时间，由右司谏升至尚书右丞、门下侍郎的苏辙，正值政治生涯的黄金时代，其革除弊政的心情更加强烈，有时甚至公然与皇帝争对朝堂，据理不让，从而冒犯龙颜，再贬南荒，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，再也未得重用。不断贬谪的生活，使苏辙常感困顿，不仅遭受经济拮据的困扰，而且失去了人身自由[5]。每次的遭贬，

都是因为“言必中当世之过”[6]，但他吃尽苦头却不改初衷。他一生不虚美，不奉承，也不避忌讳，从《上皇帝书》等青年时代的佳品，直至晚年所著《历代论》等，都自始至终贯穿着这一精神。

苏辙秉持公心、实事求是的态度，还体现在他的为人上。元丰二年（公元1079年）苏轼因诗得罪，被捕下狱，苏辙上书营救，并以辞去官职替兄赎罪[7]，这期间固然有兄弟亲情，但更重要的却是因为苏轼的蒙冤和对兄长的信任，他并不因为害怕牵连就置亲人于不顾，也不因为是亲人就避嫌而不加申诉。后来的几十年中，他倍受“乌台诗案”的牵连，但却毫无怨言。元祐前期，他为右司谏，对依附王安石、后又反脸为狼、对王安石落井下石的奸佞小人吕惠卿等痛加斥责，毫不留情，而对因政见不合被贬边荒的郑侠却大鸣不平，虽与郑侠素昧平生，但他仍恳切而真诚地替他上章，请求恢复其职。凡此种种，都体现出苏辙为人的正直，也正因如此，他才能为巢谷那样的小人物树碑传[8]。

苏辙强烈的政治热情和高洁人格的形成，一方面来自父母的良好教育和兄长优秀品格的熏染，另一方面则源于浩博的古代文化的影响。他的父亲苏洵，是位博通历史而注视现实的政论家，剴切的议论中带着正义感，他对当时的阶级矛盾有清醒的认识，在其《衡论下·田制》等文中，对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等都有深刻的揭露。他的兄长苏轼，积极用世、关心民生疾苦的精神，也对其为政为人有所鞭策。苏辙说：“先君，吾师也；亡兄子瞻，吾师友也。”[9]实无枉言。同时，苏辙自幼好读书，诸子百家，无所不览，且博通古今，著有《诗传》、《老子解》、《古史》等书。古代文化中儒、佛、

道多家的思想，都对之有所影响。儒家积极用世、君轻民贵、民为邦本等进步因素，铸就了他忧国忧民的性格，而佛、道清静恬淡、逍遥齐物的观点，又使他能以乐观豁达的态度面对人生，特别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坚贞自守、履险若夷。这其中虽有某些消极影响，但这并不有损他人格的高洁。正是由于对政治理想的执着追求和注重自己高洁人格的塑造，从而形成了苏辙文学上独有的风格。

苏辙文学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散文方面，他的文为数甚多，各体皆备，内容也很广泛。他曾说：“父兄之学，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”[10]，而他自己的创作，也同样如此，所以，他散文的成就首先体现在政论方面。苏辙的政论文，更多地继承了苏洵策论的特点，无论是针砭时弊，还是借古讽今，都显得纵横开阖，雄辩滔滔，气势畅达，且往往引经据典，分析透彻，议论剀切。同时，他还总是把抽象深奥的道理转化为通俗浅显的比喻，让人从日常生活的熟悉事例中去理解问题，心悦诚服地接受作者的观点。苏辙一生强调“养气”，认为“文者气之所形”，“文不可学而能，气可以养而致”[11]，并反复强调“养气”对于自我修养和文学创作的重要性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他特别注重文章的气势。另外，不管是对历史的评价，还是对现实的批评，苏辙总是有感而发，从而使他的政论文还在透彻精辟的说理中蕴含着深挚的感情，常常情理交融，感人至深，不仅字里行间透着浩然正气，而且其赤子之心亦明显可鉴。这些政论文，常以上疏、奏章、进策、进论的形式指斥时弊，表露心声，故其语言迂徐婉转，回环往复，有回肠荡气之势，但彬彬有礼的言词却遮掩不住犀利的锋芒。由于学识的渊博和对现实深刻的认识，苏辙众多的史论和时政论，实则就

是中国几千年古代史和北宋一百多年间现实的浓缩反映。

伴随着政论文的创作，苏辙还写了大量的游记散文和辞赋，体现了他多方面的才能和风格，这是与他强调文章风格多样化的观点分不开的。他的游记和辞赋，写景状物生动传神，历历如在目前，而且总是把情寄于景物之中，借景抒情，借景言志，叙事、写景与议论、抒情水乳交融在一起。这些文章往往随事而记、随物而写，语言清丽明快，朴实自然中透出华彩。苏轼评价他的《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》一文说：“子由作《栖贤堂记》，读之便如在堂中，见水面阴森，草木胶葛。……他日入山，不为生客也。”[12]其特色由此可见一斑。不仅如此，这些文章还同样体现了苏辙散文气势畅达的特色。如其《超然台赋》，气势磅礴，风格豪迈，实堪与苏轼之赋媲美，苏轼评其曰“精确高妙，殆两得之”[13]，实不为过。

除此之外，他还写了不少人物传记、笔记杂文及叙、引等作品。其自传洋洋洒洒近万言，畅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政治活动，展示了自己执着追求理想的一生，披肝沥胆，忠义坚贞。其他人物传记，多以小人物为主角，或叙其经历，或载其轶闻趣事，往往寥寥数笔，就使人物跃然纸上，形神毕现。其笔记杂文以《龙川略志》和《龙川别志》为代表，表现了丰富的内容，体现了苏辙政治、经济、宗教等多方面的主张。这些文章随意性极强，但大都娓娓而谈，写人栩栩如生，叙事迂徐有致，论事透彻精辟，言情含蓄蕴藉，亲切感人。至于叙、引类文字，长短不论，但大都能抓住关键问题加以阐发，并时常借题发挥，抒写自己的见解。

总而言之，苏辙散文的风格是多方面的，其成就也是巨大的，在北宋时期就已被人们与其父、兄合称“三苏”，后又同被

列入“唐宋八大家”，成为人们学习的典范。除文之外，他在诗的创作上也有较高造诣，虽比其兄之作略逊一筹，但其诗“有古人之风”[14]，体现着自己的独到之处。苏辙以其辉煌的成就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，但是，在“八大家”其他人物无限风光的时候，他却常常被人们遗忘，目前公认权威的几部文学史极少提到他，即使提及也往往一笔带过。关于他作品的选本不少，但选用的作品也大都是大家熟知的那几篇。迄今为止，苏辙众多的著作还没有一部新近完备的校注本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深深的遗憾。

一九九六年五月于贵阳

【注释】

[1] 苏轼《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四首》之一。徐永年、曹慕樊主编《东坡选集》。[2] 苏辙《上皇帝书》。[3] 苏辙《乞牵复英州郑侠状》注[2]。[4] 王安石《和张唐公马上》，李壁注《王荆文公诗》卷三十三。[5] 苏辙《龙川略志引》。[6] 苏轼《晁绎先生文集叙》，曾枣庄《三苏文艺思想》。[7] 苏辙《为兄轼下狱上书》。[8] 苏辙《巢谷传》。[9] 苏辙《历代论引》。[10] 同注释[9]。[11] 苏辙《上枢密韩太尉书》。[12] 苏轼《跋子由〈栖贤堂记〉后》，曾枣庄《三苏文艺思想》。[13] 苏轼《书子由〈超然台赋〉后》，出处同上。[14] 苏辙《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》。

上枢密韩太尉[1]书

【题解】

本文写于宋仁宗嘉祐二年（公元1057年），时苏辙十九岁，与其兄轼同中进士。苏辙写此信的目的，是想得到当时名臣韩琦的接见，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干谒文字（求见达官贵人之信），文中作者比较详细地说明了“养气说”的新涵义以及怎样“养气”的问题。表明了自己的文学主张。全文流畅婉转，疏荡而有奇气，不失为篇优秀的散文和著名文论。

【原文】

太尉执事[2]：辙生好为文，思之到深[3]。以为文者气之所形[4]；然文不可以学而能，气可以养而致[5]。孟子曰：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[6]。”今观其文章，宽厚宏博，充乎天地之间，称其气之大小[7]。太史公行天下，周览四海名山大川，与燕、赵间豪俊交游，故其文疏荡，颇有奇气[8]。此二子者，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？其气充乎其中，而溢乎其貌，动乎其言，而见乎其文，而不自知也[9]。

辙生十有九年矣。其居家与所游者，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[10]，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，无高山大野，可登览以自广；百氏之书[11]，虽无所不读，然皆古人之

陈迹，不足以激发其志气。恐遂汨没[12]，故决然舍去[13]，求天下奇闻壮观，以知天地之广大。过秦、汉之故都[14]，恣观终南、嵩、华之高[15]]，北顾黄河之奔流[16]，慨然想见古之豪杰[17]。至京师，仰观天子宫阙之壮，与仓廩[18]、府库、城池、苑囿之富且大也[19]，而后知天下之巨丽。见翰林欧阳公，听其议论之宏辩，观其容貌之秀伟，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，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[20]。

太尉以才略冠天下[21]，天下之所恃以无忧，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，入则周公、召公、[22]，出则方叔、召虎[23]，而辙也未之见焉。且夫人之学也[24]，不志其大[25]，虽多而何为[26]？辙之来也，于山见终南、嵩、华之高，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，于人见欧阳公，而犹以未见太尉也，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[27]，闻一言以自壮，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也。

辙年少，未能通习吏事[28]，向之来[29]，非有取于斗升之禄[30]，偶然得之，非其所乐。然幸得赐归待选[31]，使得优游数年之间[32]，将归益治其文[33]，且学为政。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，又幸矣。

【注释】

[1] 韩太尉，即韩琦（公元1008—1075年），字稚圭，相州安阳（今河南安阳市）人，官任枢密使，封魏国公，与范仲淹齐名，世称“韩范”。著有《安阳集》五十

卷。太尉：秦、汉时官名，宋之枢密使官位相当于太尉，故称“韩太尉”。[2] 执事：办事的人。旧时书信中表示谦敬的套语，意指自己不敢将书信直呈对方，只能请对方执事人员转达，用法同于“左右”。[3] 思之：思考作文的道理。之：代词，指为文之道。[4] 以为句：认为文章是气的显现。气，气质和精神。形：显现、体现。

[5] 然文句：指离开“养气”，舍本逐末去习文，是写不出好文章的，故为文必须先“养气”。郭绍虞先生说“子由上不能如子瞻之入化境，而下又不敢有作文之意，不欲求工于言语句读以为奇，此所以谓‘文不可以学而能’。但神化妙境虽不可学，言语句读虽不屑学，而‘生好为文’，癖性所嗜，未能忘情，于是不得不求之于气。盖理直则气壮，气盛则言宜，气是理与言中间的关键，于是想由气以进乎言宜之域。这样，所以说文是气之所形，而养气则文自工。”（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）

[6] 语出《孟子·公孙丑》。[7] 称其气之大小：符合其气的大小。称，音（chèn），符合，相称。[8] 太史公句：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：“迁生龙门，耕牧河山之阳。年古岁则诵古文，二十而南游江、淮，上会（kuài）稽，探禹穴■（同窥）九疑，浮于沅、湘，北涉文、泗，讲业齐、鲁之都，观孔子之遗风，乡射邹、峄，户（同厄）困鄆、薛、彭城，过梁、楚以归。”太史公，即司马迁，西汉杰出史学家和文学家，著《史记》。[9] 见乎其文：见，通现，表现，体现。[10] 邻里乡党：古代社会基层组织名称。《周礼·地官》曰：五家为邻，二十五家为里，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，五百家为党。[11] 百氏之书：诸子百家的著作。[12] 恐遂汨没：担心自己因此被埋没。恐，担心。遂，因。汨（gǔ）没：埋没、沉沦，引伸为无成就。[13] 绝然舍去：毅然舍弃“百氏之书”，离开故乡。指宋仁宗嘉祐元年（公元1056年）随同父兄经成都、长安、洛阳，赴汴京应试。[14] 秦汉故都：秦都咸阳（今陕西咸阳市），西汉都长安（陕西西安），东汉都洛阳（河南洛阳）。[15] 终南：山名，在今西安市南。嵩：五岳之一，中岳嵩山，在今河南省登封县北。华：五岳之一，西岳华山，在今陕西省华阴县南，又名太华山。[16] 北顾：北望。[17] 慨然：很感叹的样子。[18] 仓廩（lǐn）：粮仓。[19] 苑囿（yǒu）：指御花园。[20] 宋仁宗嘉祐二年，欧阳修兼知贡举（主考官），苏氏兄弟同在这一科考中进士，故曰“见翰林欧阳修”。欧阳修，字永叔，晚号六一居士，北宋著名文学家，古文运动的领袖，谥文忠。著《新唐书》二百二十五卷，《新五代史》七十五卷，《欧阳文忠公集》一百五十三卷。[21] 冠天下：成为天下之冠。冠：音guān。[22] 周公、召公：周公，姬姓，名旦，周文王之子。召公，姬姓，名奭（音shì），文王之子。二人均是助武王开国并佐成王立朝的重臣。[23] 方叔、召虎：方叔，周宣王时重臣，受命南征有功。《诗·小雅·采芣》有“方

叔元老，克壮其猷”等句。召虎，召公之后，谥召穆公，周宣王时，平定淮夷有功。

《诗·大雅·江汉》有“江汉之浒，王命召虎”等句。〔24〕且夫：发语词，况且，何况。〔25〕志：志力于，有志于。〔26〕何为：有什么用呢？〔27〕贤人之光耀：代指韩琦。〔28〕吏事：为官之道。〔29〕向之来：指进京应举。向：从前。〔30〕斗升之禄：微薄的俸禄，指小官吏，语出《汉书·梅福传》：“民有上书求见者，辄使诣尚书，问其所言，言可采取者，秩以升斗之禄，赐以一束之帛”。〔31〕赐归待选：准许还家，等候吏部选用。〔32〕优游：空闲。〔33〕益治其文：更加努力地写作。其，代词，我。

【译文】

太尉执事：我天生喜欢写文章，并对作文之道思索很深。我认为，文章就是气的显现；但是文章却不能仅靠学就写得好，而气却能靠养而得到。孟子曾说：“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。”如今观察他的文章，宽厚博大，充满于天地之间，符合其气的大小。太史公司马迁行于天下，遍览了全国名山大川，与燕、赵之地的豪杰交游，因此，他的文章显得疏荡，很有奇气。这两个人，难道曾只是拿起笔学写这样的文章吗？是其气充满于他们内心，并洋溢于他们的外表，跃动于其言语之间，然后表现在文章当中，但他们却并未意识到罢了。

我出生已经十九年了。我在家时与我交游的人，不过都是我的乡里乡亲，所见之景也不过就在几百里之间，没有高山旷野可以攀登观览，以扩大我的视野；诸子百家之书，虽然无所不读，但都是古人过时之事，不足以激发我的志气。我担心由此被埋没，因而便毅然舍弃百氏之书并离开家乡，寻求天下奇闻异事和壮观之景，以此了解天地之广大。在经过秦、汉旧都咸阳、洛阳、长安之时，纵情观览了终南山、嵩山、华山的高峻之景，往北望见了波涛滚滚的黄河，感慨之余想到了古时那

些豪杰之士。到了京城开封，敬观了皇上壮美无比的宫阙，和富庶的粮仓、府库、高大的城池、广阔的御花园，然后才知道天下是如此广袤壮美。见到了翰林学士欧阳修，聆听了他宏辩的议论，目睹了他秀伟的容貌，和他门下的贤士大夫们交游，然后明白了天下的文章都集中在欧阳公之处。

太尉你凭着自己的雄才大略成为天下第一的人，天下人依靠你而无忧虑，四方少数民族畏惧你而不敢侵扰，你在朝内犹如贤能的周公、召公，在外任职则似勇武的方叔、召虎，可我却还未见到过你。况且，人们研究学问，不立志从大处着眼，即使再多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我这次来京城，在山方面看到了高峻的终南山、嵩山、华山，在水方面见到了深广的黄河，在人方面拜见了欧阳修先生，但是却还没有能见到太尉您，所以，我非常希望能一瞻您的丰采，聆听片言只语以增强我的信心，然后可以说把天下一切壮美的事物都接触过、且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。

我还年轻，没有能够透彻地学习为官之道，这次到京城应试，并不是为了谋取一官半职，如果偶然得到，也不是我所乐意的事。然而所幸的是我得到了允许还家等待选用的安排，使我又有了几年空闲的时间，我将回去进一步研究我的写作，并学习处理政务。太尉如果认为我还可教并且愿屈尊赐教的话，那更是我莫大的荣幸了。

上皇帝书

【题解】

本文选自《栾城集》（四部备要本）卷二十一。熙宁二年（公元1069年）三月，苏辙三十岁，守父孝刚除丧服，时正值宋神宗嗣位之初，即上此书言时事，指出当时天下之急务在于丰财，而丰财必除“三冗”的观点，并详细论述了何谓“三冗”以及如何除之的办法。全文观点明确，言事大胆，议论迂徐婉转而又笔锋犀利，语言自然质朴但却富于气势，极能体现苏辙汪洋淡泊的散文风格，亦能体现其沉静简洁、耿介忠贞的性格特征。本文有删节。

【原文】

熙宁二年三月日，具位臣[1]苏辙谨冒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[2]：臣官至疏贱，朝廷之事非所得言，然窃自惟虽其势不当进言，至于报国之义犹有可得言者。昔仁宗亲策直言之士，臣以不识忌讳得罪于有司，仁宗哀其狂愚，力排群议，使臣得不遂弃于世[3]，臣之感激，思有以报为日久矣。今者陛下以圣德临御天下，将大有为以济斯世，而臣材力弩下[4]，无以自效，窃听之道路，得其一二，思致之左右。苟惩创前事不复以闻，则其思报之诚没世而不能自达，是以辄发其狂言

而不知止。

臣闻善为国者，必有先后之次，自其所当先者为之，则其后必举；自其所当后者为之，则先后并废。

《书》曰：“欲登高，必自下；欲陟远，必自迩[5]。”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，不自近而能远者，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厌其近，务先从事于高远，不知其不可得也。《诗》曰：“无田甫田，维莠骄骄。无思远人，劳心忉忉[6]”，以为田甫田而力不给，则田蕪而不治，不若不田也；思远人而德不足，则心劳而无获，不若不思也。欲田甫田，则必自其小者始，小者之有余而甫田可启矣；欲来远人，则必自近者始，近者之既服，而远人自至矣。苟由其道，其势可以自得；苟不由其道，虽强求而不获也。臣愚不肖，盖尝试妄论今世先后之宜，而戡窃观陛下设施之万一[7]，以为所当先者失在不为，而所当后者失在于太早。然臣非敢以为信然也，特其所见有近于是者，是以因其近似而为陛下深言之。

伏惟陛下即位以来[8]，躬亲庶政[9]，聪明睿智，博达宏辩，文足以经治，武足以制断[10]，重之以勤劳，加之以恭俭，凡古之帝王旷世而不能有一焉者[11]，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。夫以天纵之姿济之于人[12]，以求治之心施之于事，宜无为而不成，无欲而不遂。今也为国，历年于兹，而治不加进，天下之弊日益于前，天下之人未知所以。适治之路灾变横生，川原震裂，江河涌沸，人民流离。灾火继作，历月移时而其变不

止[13]，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晓，疑其先后之次有所未得者也。夫今世之患，莫急于无财而已。财者，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，国之所以存亡，事之所以成败，常必由之。昔赵充国论备边之计，以为湟中各斛八钱，余三百万斛，羌人不敢动矣[14]。诸葛亮用兵如神，而民粮道不继屡出无功[15]，由是观之，苟无其财，虽有圣贤不能自致于跬步[16]；苟有其财，虽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。陛下顷以西夏不臣[17]，赫然发愤建用兵之策[18]，招来横山之民将夺其险阴，破坏其国而后已[19]。方是之时[20]，夏人残虐失众，横山之民厌苦思汉而又乘其荐饥[21]，苟加之以兵，此非计之失者也。然而沿边无数月之粮，关中无终岁之储，而所兴之役有莫大之费，陛下方且泰然不以为忧，以为万举而有万全之功。既而边臣失律[22]，先事轻发[23]，亦既入践其国、係虏其民矣[24]，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，获其人而不敢臣，虽有成功而不敢继也，其终卒至于废黜谋臣而讲和好。夫陛下谋之于基年之前而罢之于既发之后[25]，岂以为是失当而悔之哉？诚无财以善其后尔。且夫财之不足是为国之先务也，至于鞭笞四夷、臣服异类，是极治之余功，而太平之粉饰也。然今且先之，此臣所以知其先后之次有所未得者也。今者陛下惩前事之失，出秘府之财[26]，徒内郡之租赋，督转漕之吏[27]，以备沿边三岁之畜[28]，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财矣。然犹以为未也，何者？秘府之财不可多